

侨乡银莲

庄河水



海峡文艺出版社

侨乡银莲

冰心题



庄河水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侨乡银莲

庄河水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2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三明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10 印张 3 插页 208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80534—670—4

I·565 定价:6.80 元

目 录

第一辑 报告文学

石破天开	(3)
侨乡银莲	(15)
“傻”女人	(31)
大海的女儿	(37)
彩色的理想	(51)
他习惯负重行走	(63)
奉献	(76)
开拓者的足迹	(90)
胸怀	(107)
送美送香的人	(116)
橄榄绿之歌	(122)
儒将风采	(134)
公仆	(147)
化作春泥更护花	(159)
哨所战士的母亲	(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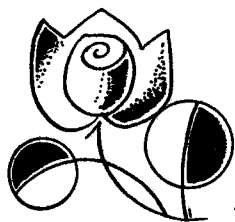
攀登者	(182)
人生价值	(191)
当代农民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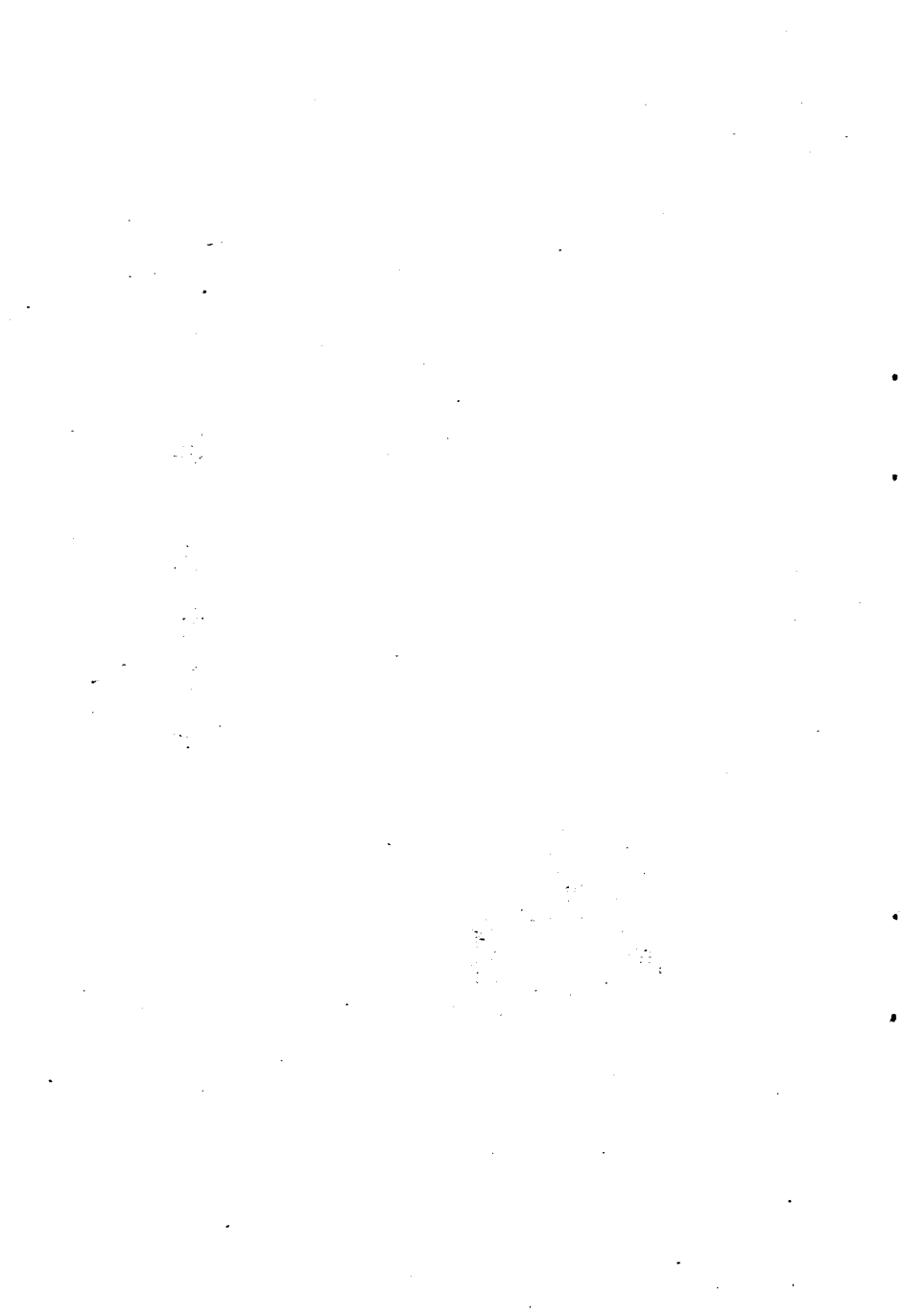
第二辑 散文

堂妹	(217)
养对虾的姑娘	(221)
兰花颂	(225)
晚霞	(227)
牛颂	(229)
金刚石赞	(233)
迎富村纪事	(235)
一片冰心在玉壶	(238)
水仙花开	(240)
复苏的山村	(245)
在蘑菇王家里作客	(247)
脚手架	(251)
捅不开的“锁”	(255)
春雨	(259)
珍贵的画像	(264)
凌波仙子	(268)
老黄牛的性格	(273)
她不幸提前到来	(278)
高楼与陋室	(281)

静夜	(283)
失约	(285)
做生意	(288)
钱老师	(290)
溪边洗衣场	(292)
番客婢的女儿	(294)
钓	(296)
理发	(299)
太武山	(304)
木棉庵	(306)
百花村	(308)
瑰丽的夕阳	(311)

第一辑 报告文学





石破天开

一只猴子，在一座石山下压了 500 年，一旦石破天开，猴子腾空而起，变成了神力无比、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的孙大圣。

应该说，他远不止被压抑了 500 年。

他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祖父的祖父……这些九龙江下游漳州小平原上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小农百姓，只有到了他，只有到了今天，他才可能变得如此才气横溢，如此满面生辉，如此聪明机智，浑身的每一个部位，都可以成为表现力的象征。

在祖国的首都北京，他，王长生，福建省龙海县九湖乡塑料编织厂厂长，做为一个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亲切地把手伸给了他……

1987 年全国评出 100 名优秀农民企业家。福建省有 12 万乡镇企业，但只评上 4 名，王长生是其中之一。

巨大的荣誉，巨大的温热、关怀和鼓舞，带给一个像土地一样朴实的农民，是一种长久激动不已的欢乐。

王长生无比珍惜这种欢乐。因为，这种欢乐的每一根经纬，都是由许多痛苦编织成的。

从北京开完授奖大会回来，王长生在厦门机场扶着舷梯步下飞机，迎向漳州市委专程迎接他的小车时，他没有飘然欲仙的感觉，反而有一种惶恐感，觉得眼前交叠着许多紊乱的映

像：

仿佛他正在扮演杨子荣打虎上山……

仿佛他的儿子正拿着一个破钢精锅盖向他走来……

仿佛有一个疯子在村巷里奔跑、狂笑……

这是错觉。

但每一个错觉都是生活的积淀和深化。

那是什么光景呢？那时候尽管人们饥肠辘辘，一个个都是菜黄色水肿的脸，但精神却很“富足”，好像每个人都是腰缠万贯的富翁。王长生是大队团支部书记，积极争取入党，当然就要表现得比谁都更加“富足”。

他带领村里的一帮青年男女演唱革命样板戏。那是一种思想的宣传队，唱的可以饿着肚皮唱，听的可以饿着肚皮听，要唱的、听的都从骨髓里挤出一股干劲来。

王长生从小爱哼哼家乡的闽南芗剧小调。尽管他没有跟过班，喝过戏粥，唱起来有时候难免走板走调，但他身材魁梧，声音粗犷、宏亮，外表很有一点“第一号英雄人物”的样子。那一天，在大队部礼堂里彩排，他扮演杨子荣“打虎上山”那一段，做功、唱腔且不说，单是那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就逼真得十分可以。

但是，等“英雄人物”卸了妆走出大队部礼堂时，却见他那七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个破钢精锅盖从一条村巷里走过来，他把小儿子叫住查问。

小儿子哭丧着脸回答：“妈妈叫我到供销社把它卖了，卖了买盐巴。”

王长生听了心里烫了一下，愣愣的站在原地不吱声。

是啊，杨子荣是不需要盐巴的，但他家里却不能连盐巴也没有啊！

儿子以为父亲没有听清他的话，继续说：“妈妈在家里翻找了好久，说别的东西都不能卖钱，可能就这个还能卖一点钱。”

王长生摸着儿子的头。这个扮演“英雄人物”的人物，浑身摸遍，才摸出两毛钱给了儿子，然后含着眼泪赶紧掉转身走开了。

为什么会搞得这么穷呢？是因为王长生懒？是因为王长生无能？

不！在九湖新塘村父老乡亲们的心目中，王长生从孩提时，就是一个“学什么，会什么；做什么，像什么”的农家奇人。

王长生小学没读完。不是他不会读，是他没法读。他父亲早丧，上有孱弱的母亲，下有幼小的弟弟，生活迫使一个少年过早地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大跃进的1958年，王长生被招工到漳州市麻纺厂，进机修车间当了一名学徒工。

镰刀变成了锤子，王长生变成“工人阶级”了。他激动、兴奋，拼命地卖力工作。什么苦活、脏活都少不了他。对谁他都恭恭敬敬地巴结、讨好。聪明、伶俐，又加上勤奋、朴实，使哪一位老师傅都喜欢上这个小伙子；车、刨、削、钻，车床上的把式，样样都有人乐意传授他。他样样都学，而且比别人学得快，学得精熟。

但是，他是属“土”的命。1962年工厂精减人员，他是从农村的土地上来的，他又被赶回到农村的土地上。

王长生不肯认命，他奋力地挣扎，他要自己脚下这块土

生土长的土地上，改变自己土生土长的形象和命运。

他像板结的地表下的一条蚯蚓，艰难地伸曲着、蠕动着，一点一点地挖掘寻觅着出路的通道。

可惜找不到出路。

王长生当了三年的生产小队长。他的生产小队连续三年都是“学大寨”的先进小队。但是，“学大寨”的结果是越学越穷，先进小队比后进小队更贫穷。

后来，王长生到离村六、七里路的荒山上去当耕山队队长。他带领十三个青年到山上安营扎寨，以粮为纲，开荒种植三十多亩水稻，同时综合经营，养猪、养牛、养鸡鸭，还种植了一批荔枝、龙眼等果树。

王长生带领的耕山队为大队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大队也给耕山队队员们最高的报偿，每天 12 个工分。一个工分人民币 5.5 分，12 个工分六角六分钱，以当时的价格，只能买 2 盒一般的香烟。

王长生也动过钱的脑筋。他学过几年机修，一般的农机，不管是拖拉机，还是抽水机，在他手上摆弄、摆弄，就能修理起来。有时候缺少一些市场上买不到的零配件，他没有任何设备，锉锉锯锯的就自己搞了起来。凭他的本事，为什么不在村里弄个粮食加工厂呢？于是，他与乡亲们筹集了一些钱，东拼西凑，真正是“土法”上马凑起了一个面粉加工厂。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面粉厂就盈余净赚利润三千多元。

三千多元，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数额，但也是一笔巨大的罪恶。县里派了工作组来，作为一条资本主义大尾巴的典型，特地做了专门的调查研究和思想批判。在工作组的心目中，社

会主义姓穷不姓富，农村劳动致富比魔鬼还吓人，越是贫穷才越革命。

面粉加工厂当然地被解散了。王长生只是暗暗觉得可惜，乡亲们也只是暗暗觉得可惜，但谁也不敢说个“不”字，谁也都认为真正是自己走错了道路，迷失了方向。

多么可怜的人啊！大家只知道怨怼自己穷，却不知道怨怼自己为什么穷。

实际上，在这片富饶的闽南漳州小平原上，每一个农民百姓都和王长生一样是勤奋的能人。他们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去，一年种两季稻，一季麦；两季稻的每亩单产平均高达一千八百斤。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水稻能手。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一字不识，但被请到非洲一些国家，就成了指导水稻种植的专家。但是，他们的妻小儿女，平均每人每月才十几斤稻谷的口粮。只有在端午、中秋、过新年等这样农家大节日里，他们才勉强撑持着吃上白米干饭。因为能吃上白米干饭，常常使那些又脏又瘦的小孩子们，欢腾雀跃地高兴了好几天。

他们都是能人。但他们头上都有一道“紧箍咒”。他们都一样穷，都挤在拥挤的土地上没有出路。

一个阴雨凄凄的寒冬腊月的傍晚，一个疯老婆子只穿着一件破烂的单衣，在坑坑洼洼的村巷积水里，跌跌撞撞地一边走，一边唱；一会哭，一会笑。她的老伴瘸子周大伯一颠一拐地跟随着她：“回去吧，造孽啊！回去吧，造孽啊！……”他们唯一的一个女儿出嫁了，女儿穷得无法赡养他们。两个老头老婆相依为命，但却无法糊口。周大婶愁肠千千结，竟然发了精神分裂症。

小姑娘陈亚月的父亲因病早故了。母亲拉着她和弟弟，还有一个 78 岁的婆婆，一口黄连一口醋，含着辛酸苦泪煎熬日子。但终究还是煎熬不下去。为了活命，母亲带着五岁的弟弟改嫁了。

那时亚月姑娘虚岁才十四。母亲走的时候把她拥在怀里哭得死去活来，但最终还是咬着牙根走了，不能四个人都死在一起啊！她只能狠心把女儿和婆婆撇下。

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怎能供养一个 78 岁的老祖母？！她们只能今天这里吃一餐，明天那里要一口，这个日子怎么打发呢？王长生为祖孙二人操尽了心，他多么希望能给她们安排个出路啊！

但是，万万没有料想，贫困的灾难，甚至更严重地降临到他的头上。

1975 年 5 月，王长生仍在积极地争取入党，一心都扑在大队副业队的工作上。可是，已经是共产党员的他的妻子，却承受不住贫困的重压——婆婆病恹恹的卧床不起，三个幼小的儿女嗷嗷待哺，她拾了一条便捷的路，悬梁自尽，摆脱了千愁万苦的人生。

王长生抱着妻子的尸体肝肠俱裂，却欲哭无泪。他这才清醒，这才明白，并非共产党员都是特殊的材料做成的。他的妻子首先是个农村妇女。她同任何人一样需要活命的口粮，需要痛苦中感情的藉慰和支持。他捶胸顿足地痛恨自己。但悔之晚矣，已经太迟了，妻子已关闭上温顺又善良的眼睛，永远、永远地离开了他。

王长生在清醒中开始绝望。如果不是因为“四人帮”的垮

台,如果不是因为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解脱了人人头上的“紧箍咒”,也许王长生将从此永远地颓废下去。

使王长生点燃智慧火焰和希望之光的机会,是1980年对村办木箱厂的承包。那时候,村办木箱厂实际上已办不下去,濒临倒闭关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大队才根据承包的精神,允许人们投标承包。在没有人敢承包的情况下,王长生出高标,按木箱厂历来最好经济效益指数的2倍,把木箱厂承包了下来,净利润同大队五五分成。

当然,谁都怀疑王长生言过其实,夸下了海口。但谁都希望王长生成功。

王长生成功了。到了第三年的1983年,经过三年的苦心经营,扣除成本、税收,王长生为集体增加收入三万多元,自己也赚了三万多元。

所有人的心都被强烈地震动了。

大多数乡亲为王长生喝彩。不错,王长生赚了大头,但乡亲们都在他的精明经营中,获得了好处。更重要的是,他们从王长生的身上,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个农民的价值,也是自我形象的价值。他们希望王长生永远当他们的领头人。

但也有不少人,妒意像酸醋一样侵蚀着狭窄的心田,特别是一些手头上掌握有一定权力的人。这些人似乎有许多懊悔。懊悔自己当时犹豫不决的不敢挺身而出;懊悔给王长生定的指数太低,定的分成指标太高。于是,他们从理论上关心起社会主义,关心起道路和方向的根本问题……

王长生同谁也不争,同谁也不吵,客客气气地把已经搞得活转的木箱厂,拱手让了出来,让给那些说是“心红”,其实是

“眼红”的人。这些人理所当然地接管了过去，承包了下来。他们认为王长生已经赚够了，赚饱了，现在应该轮到他们来赚个三万多元。

可是，黄金遍地，唯才者方能获取。他们不会经营，又七个人八颗心，才承包一年多，木箱厂又垮了下来，每人亏损 600 元，垂头丧气地鸣金收兵。

这是后话，且不去管它。

且说王长生拱手让出木箱厂后，并没有躺在三万元上吃利息，过安乐日子。他心更大，心事更多，眼光更远，想赚取更多、更多的钱。他到外地转了一圈，把市场的信息、行情摸索探究一番，决定筹建塑料厂，从搞木箱硬包装，转为生产编织塑料袋软包装。

建塑料厂要投资 30 万元，这是一笔巨大的数目。

王长生胸有成竹，早已为全村的乡亲们构想了一幅脱贫致富的蓝图。他挨家挨户地动员说服人们入股：每股 500 元，一股招收一个劳力，除劳力工资收入外，年终按股份分红。

不几天，全村已有 50 多户农民报名入股。当时，对于每户农民来说，500 元重大得像半壁江山，他们许多人甚至借钱借债凑齐了股金。但他们信得过王长生，愿意跟着王长生冒风险。这里面，除了相信王长生的本事和开拓能力外，更相信他透明得看得见心肝五脏的人格力量。

王长生把承包木箱厂赚的三万多元，全数投进了塑料厂。

王长生说服儿女，把卖水仙花的当年收入也投进了塑料厂。

王长生动员老母亲，把喂养的三头大猪卖了，卖的钱也投

进了塑料厂。

他自己家里住房狭小拥挤。他说尽人情向姐夫借了一个房间，借来房间当办公室。办公室里什么都没有，他把家里的条凳、茶几都搬去了。

厂房是原来生产队的集体猪舍，在猪舍上平整了一下，搭了简单工棚。

除了必要的主机外，其它附属的机器几乎都是购买最陈旧、最原始的。有的机器已经不能动弹，经王长生敲敲打打的修理一番便转动了起来。从安装、试车到投产，车、削、刨、焊，几乎每一个工种都离不开他。

塑料厂终于投产了。在九湖新塘这个闽南水果之乡的小村庄里，在一片茂密的荔枝树林下，有史以来第一次响起了“沙沙拉拉”的机器编织声。

这是一片新声，一片农民改变自己形象和命运的新声。

王长生是崛起在这一片新声中的新人。

他把整个身心都投在这个塑料厂里。他的住家离工厂不过一百多米，但却难得回一趟家。他把铺盖卷到厂里来了，日夜守在工厂里，三餐由女儿往工厂里送饭。

他全家投进四万多元，按 500 元一股，应该占有 80 多股。但是，头一年干下来，年终分红时，王长生只按他和儿子两人在工厂里，一人分一股的红。

王长生每月工资 70 多元，只拿中等水平的报酬，比同等技术水平的工人少拿四、五十元。股东们心里过意不去，要给他加薪，发重奖，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什么是小农的意识呢？小农意识的概念应该有了新的诠